

·专访·

思考与探索:新型智库建设

田晓明 张婷婷

编者按:随着《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推进计划》《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等文件的相继出台,智库作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受到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国家发展呼唤着中国特色新型智库,而智库建设则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国梦”的实现提供重要的智力支撑。然而,国内理论界对于智库、尤其是大学智库的概念、特征以及功能定位等理解尚且处于较为粗浅的阶段,尽管目前已经开展了一定研究,但无论其研究的内涵深度、研究的特色强度以及研究队伍的专业化程度,均与当前中国之大国地位相去甚远。苏州大学智库建设起步较早,于 2013 年底正式注册“苏州东吴智库文化与社会建设研究院”(简称“东吴智库”),而成为国内高校首家以“智库”形式注册登记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目前成效比较显著且呈现良好的发展势头。为进一步加强对“智库”概念的理解,有效推进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我们采访了苏州大学副校长、“东吴智库”理事长、总执事田晓明教授。



一

张婷婷(以下简称张):田校长您好,近年来,“智库”逐渐成为中央关心、社会关注的热点话题,但目前学界和实务界对于“智库”尚没有一个准确的概念。我们知道您在国内高校较早提出“智库”的概念,能否和我们分享一下您对于“智库”的理解?

田晓明(以下简称田):“智库”这个词是由英文“Think Tank”翻译而来,以前也被译作“思想库”。广义而言,智库自古有之,但早期形态的智库与现代智库的基本特征相去甚远。严格地说,智库是近现代的产物,关于现代智库的起源,有多种不同的见解。一般认为,“智库(Think Tank)”这个词最早出现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即 20 世纪 40 年代)的美国,是指当时军事人员和文职专家聚集在一起制定战争计划及其他军事战略的安宁环境(研讨室)。后来泛指以工业政策研究为中心,以公共政策和舆论为目的的政策研究机构。

张:正如您刚刚提到“智库”产生于

美国,二战以后得到较快地发展。我看到一组最新统计数据,2013 年全球智库总数 6826 个,其中美国有 1828 个,占全球智库总数的 27%;而在全球顶级智库排行榜中,美国智库独占前十名中六席之地,数量多且实力强。那么,我能否理解“智库”就是美国人的专利?

田:从一定层面上你可以这样理解,确实美国智库是现代意义上“智库”的发祥和集大成者,但我们同样要看到,“智库”这一理念在中国自古有之。在中国古代,历代贤明的帝王将相都深知智囊在维护统治、推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因而广泛招贤纳士,并通过召对、会议、奏章等形式,广泛咨询听取贤才们的意见。于是,便有了门生、食客、谋士、师爷等行业或称谓了。比如说,商朝的兴起得益于伊尹等智者;周朝的兴起更是因周公旦、太公望等人辅政有方。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养士”成为一种时尚。当时号称“四公子”的孟尝君、春申君、信陵君和平原君,都以“养士”著称,各有门客数千人。春秋初期的政治家管仲,以他出色的智谋辅佐齐桓公,使其成为五霸之首。汉

朝,正是有了张良、萧何、韩信等的辅助,刘邦方能夺取天下;三国时期,诸葛亮辅助刘备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明朝时期,朱元璋也是借助于刘伯温等人的智谋之本,当上了开国皇帝。而到了清朝,智囊开始走向职业化,开府设幕已经成为国家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康熙在乾清宫设置的南书房就是帝王的主要顾问机构,等等。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中国古代,智者很早就构成了国家治理模式的一个重要特征,可以说是“智库”的萌芽。

张:刚才您介绍了中国古代的“智库”,那么当前我国现代智库发展如何呢?

田: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智库发轫于改革开放以后。当时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和国家领导集体认识到决策咨询的战略意义,多次提出要实现“决策科学化”,官方智库、半官方智库、民间智库开始大量涌现,陆续成立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民经济研究所、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北京零点调查公司、天则经济研究所等官方、半官方、民间智库机构。与此同时,现代智库的理念也逐渐从西方发达国家传播过来,一些国

·专访·

外智库开始陆续进入中国。发展到今天,我国已经形成了一个较为完备的智库体系,我将之分为五大类:第一类是“御用”智库,主要是各级党委政府研究室、发展研究中心以及各政府部门内设的专门研究机构等。这些研究机构属于各级党委和政府,直接为党委、政府决策服务。这类机构基本按照党政组织及其领导的工作部署进行“命题性”调研,其研究结果直接为决策组织及领导服务。第二类是官方智库。党校、社科院等事业性单位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兼具官方和半官方色彩。由于在中国政治结构中处于有利地位,其政策研究和服务方式都十分便利。这些机构的研究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其中,党校还承担着培训中国各级领导干部的任务,因此对各级领导干部的决策思想、舆论导向和政策出台有更直接的影响。第三类是大学智库,即大学里各种社会科学院系和各种社会科学研究机构,此外,还有一些专业性的学会组织。它们独立自主性强,学术意识浓厚,研究水平高,经费主要来自学校内部拨款、研究人员的课题研究经费和其他渠道的赞助,研究成果的发布主要通过学术论文的发表,课题成果的宣传。第四类是企业智库,即企业里的各种研究机构。这类研究机构一般关注与自身行业联系密切的研究主题,由于与社会经济影响和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特别涉及到社会、经济热点问题的研究报告往往能引起社会的关注,通过媒体宣传对党委政府以及各级领导决策能产生一定的影响。第五类是民间智库,即民间注册的独立的研究机构,如零点调查、天则经济研究所、思源社会科学研究中心、治方研究基金等。这种纯民间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在中国数量很少,生存环境还比较脆弱,但由于其研究成员往往集中了社会知名研究专家,有比较完善的宣传平台和较强的社会影响力,其研究成果往往开明、大胆、创新性强、“上谏”意识浓厚,发展空间很大。

张:纵观古今中外的各类智库,似乎“智库”最主要、也是最重要的功能就是为政府提供决策咨询,对此,您怎么看?

田:你可以这样理解,但是不够全面。我们以美国智库为例,作为除立法、行政、司法和媒体之外的“第五种权力”,美国智库的基本功能就是为政府提供决策咨询,以提高政府决策质量。主要体现在四方面:一是生产思想。智库的主要产品是专业知识和思想。有人把美国智库看作是“知识工厂”或“思想工厂”、“点子工

厂”等。智库是一个没有学生的大学,一个有着明确目标和坚定追求,却同时无拘无束、异想天开的“头脑风暴”中心,一个敢于超越一切现有智慧、敢于挑战和蔑视现有权威的“战略思想中心”。二是设计政策。智库通过研究为政府提供政策建议。其中最有说服力的是智库和总统候选人的密切合作,为总统候选人提供施政方案:比如布鲁金斯学会帮助卡特成功竞选总统;传统基金会提交的《领导人的职责:打造保守型政府之蓝图》,为里根政府设计了执政方案;进步政策研究所为克林顿政府设计了政策报告《变革的使命》……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三是影响舆论。智库还扮演着教育者的角色,利用专业知识和思想向大众宣传政治、经济问题,塑造公众舆论。如“9·11事件”之后,布鲁金斯学会在第一时间就发表了《恐怖组织与美国外交政策》一书,论述了美国反恐政策的必要性及对策。四是汇聚人才。智库是从事政策研究的独立性机构,人才是智库生存和发展的核心要素。智库不仅是未来研究人员和决策者的培养机构、社会精英人物的“俱乐部”,也是政界和学界的“旋转门”。

张:能否请您为我们解释一下何为“旋转门”?

田:“旋转门”是美国智库的独特机制。在美国,智库成员出入政界已成为美国政治的一大特色。一方面智库将精英输送到政府机构任职,由研究者转变为决策参与者;另一方面也为在政府换届中下台的官员提供容身之所,从而积蓄了很大的人脉资源,这就是美国智库的“旋转门”机制。这种机制既为政府提供了具有丰富专业知识和能力的官员,又为智库提供了大量拥有丰富政治经验的研究人员。比如基辛格从哈佛大学国际事务中心进入政界任职美国国务卿,卸任后又成立了基辛格国际咨询公司并担任董事长;赖斯也是从大学教授进入政界担任国务卿,卸任后又回到了斯坦福大学的胡佛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一定意义上说,美国智库的“旋转门”机制也是美国两党制度的产物。如果大家想全面了解智库尤其是美国智库的“旋转门”机制,我可以推荐中国人民大学王莉丽教授的著作《旋转门:美国思想库研究》这本书,个中有比较全面、精到的阐述。

张:刚才您谈及了智库的一般功能,这些功能往往与其基本特征是相对应的。我想分享一下您对智库基本特征的理解!

田:分析一些发达国家智库尤其是美

国智库,我们不难发现,智库最基本的特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独立性。与政府保持“一定距离”,即便研究内容、经费来源与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智库(尤其是美国智库)也始终坚持将“独立性”作为确保决策咨询客观、全面的基础。二是非营利性。智库虽然可以“公司”冠名(比如兰德公司),但其性质仍属于研究机构,既不以营利为目的,也不直接代表利益集团,而是以自身研究观点和成果影响公共决策。三是现实性。智库虽然以学术研究为手段,但与纯学术机构有着本质区别,更关注当下,力图解决现实问题。学术研究通常侧重于建立理论模型,归纳具有普遍性的行为规律,过于抽象和理论化。由于绝大多数学者并不清楚政府政策制定的规则,因此他们所提供的建议通常不具有实践可行性。而智库强调以(公共)政策为研究对象,以影响(公共)政策为目的。应该说,任何一种形态的智库,都应该拥有这些基本特征,或部分拥有这些基本特征。否则,这一组织作为智库形态或智库名称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必将遭遇质疑。

我刚刚所说的只是一般智库的基本特征,这也是我个人的阅读心得或个人见解,不一定全面和准确。事实上,一些著名智库都拥有自己的特色或特征,比如说,曾在美国布鲁金斯学会担任董事多年的约翰·桑顿先生就曾经总结布鲁金斯学会的基本特征或核心价值:质量、独立性和影响力。有两点是公认的,一般智库尤其是美国智库的基本特征就是:独立性和非营利性。

张:目前学界有人提出“智库产业化”,而您刚才提到了“非营利性”是智库的重要基本特征,那么是否意味着“智库”就是公益性的社会组织?

田:对于智库“非营利性”(not-for-profit)特征的理解,人们认识上尚存在不少误区。有人认为,非营利就是不赚钱或不能赚钱;智库只是打着“非营利性”的幌子,事实上就是“唯利是图”;有人索性公开提出了“智库产业化”观点;等等。显然,这些认识都是错误的。问题的关键在于此种观点的持有者没有准确地把握智库的本质内涵。作为独立于政府部门之外的第三方非营利性研究机构,智库所具备的“独立性”和“非营利性”是区别于其他社会机构的最本质特征。我认为,“非营利”不是无利润,更不是不讲经营,而是指组织机构的经营、运作不以获取利润为目的。智库无疑可以营利(盈利),而且必须营利(盈利),因为

·专访·

没有强有力的经济支撑,智库作为独立存在的社会组织是无法生存和持续发展的。然而,我们不能因为智库的营利(盈利)便武断地否定智库“非营利性”这一本质特征。尽管智库从事营利(盈利性)活动,甚至可以“公司”冠名(如美国的兰德公司),但智库不是以营利为目的,也不直接代表某个(些)利益团体,而是以自身的研究观点和成果影响公共决策。否定智库的“非营利性”特征,甚至认为智库就是企业或智库产业化,其实是混淆了智库的基本概念。众所周知,“以市场为导向、以效益为中心”是企业或产业化的基本内涵,其核心为追求效益最大化,因而带有鲜明的市场属性。相比较而言,智库强调决策服务的公共性,而企业或产业化则强调市场导向的效益性,两者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差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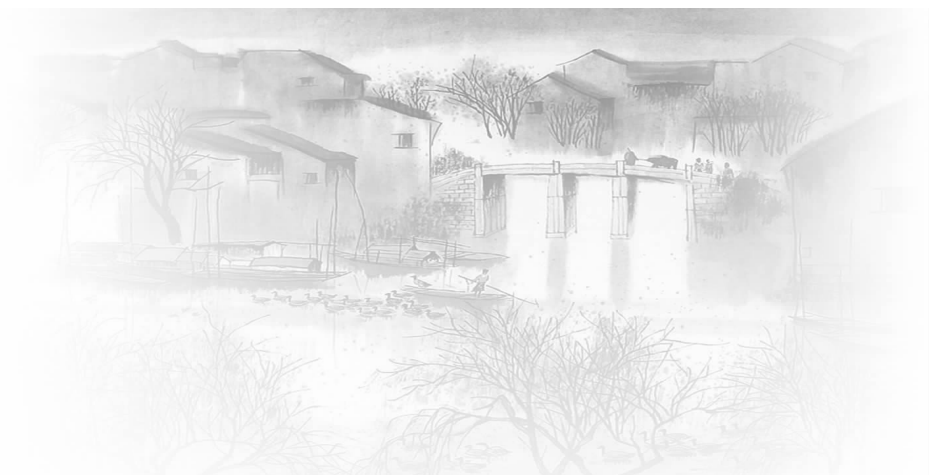
二

张:您之前提到智库的四项功能,包括“生产思想”、“设计政策”、“塑造和影响公众舆论”和“汇聚人才”,大学的功能几乎可以全部“覆盖”,甚至内容更加丰富。那么,是否“大学”就等同于“智库”呢?

田:大学智库是智库的一种特殊形态,是现代大学社会服务功能的一种具体表达与彰显,也是现代大学循序发展的历史产物。从一定意义上看,大学具备“智库”的全部功能。

以“生产思想”功能为例,科学研究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是“生产思想”的主要基础,大学教师不仅肩负着维系和传播人类文化知识的历史使命,同时也承担着探索未知的科学研究重任。换言之,大学教师本身就是相关学科或专业的学者和专家。以科研成果服务社会,不仅是智库的主要功能,也是大学的基本功能。大学科学研究的功能指向(或旨趣)不仅是为现实社会服务,更多的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服务,相对于智库“生产思想”主要服务于现实社会而言,大学之科学研究功能无疑具有更深远的意义。

再以“汇聚人才”功能为例,智库为现实社会储备和培养了很多未来研究人员,而被人们称颂为“社会精英人物的俱乐部”,并且缔造出有名的政界和学界人才顺畅流动的“旋转门”机制。但考察大学人才培养功能,就不难发现,大学拥有一大批专业精英,这本身为智库乃至社会提供了坚强而现实的人才支持,而且还为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人



力资源后援。可以说,大学“汇聚人才”之功能效用也许没有智库直接和现实,但绝对比智库强劲和持续。因此,大学在“生产思想”、“设计政策”、“塑造和影响公众舆论”以及“汇聚人才”等功能效用方面,远比智库丰富和强大。诚然,这并不是说大学就是智库,或者说大学可以替代智库。

理性主义大学理念主导下的现代大学,将大学教育、科学研究与人自身的修养紧密结合,追求真理,追求人的全面发展。在这一背景下,大学与社会的联系几乎是“断裂”的,因此很难找寻到“智库”的“痕迹”。而实用主义大学理念主导下的现代大学,则主要强调大学服务社会的现实功用,强调将大学教育与科研转化为推进社会发展的力量。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大学从“象牙塔”走向了“世俗社会”,这无疑在大学经历社会化、世俗化和功利化的过程。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大学社会服务功能通过“智库”的形式逐渐表达和彰显出来,事实上,人们也习惯地将大学比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思想库”或“智囊团”。从本质上说,大学智库就是实用主义大学理念的产物。

然而,大学还是大学,并没有因为其功能的增加而发生本质的变化。换言之,大学与智库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差异。这种差异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表现在“有无学生”。智库是一所“没有学生的大学”,而大学最本质的特征就是学生的培养;二是表现为科研成果表达的旨趣以及形式的差异。智库是将科研成果以“研究报告”、“咨询报告”呈现给政策制定者,以提高决策质量,而大学科研成果更多的是以学术论文或专著给予表达,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三是大学服务社会的路径与智库不尽相同。智库仅仅依靠研究成果服务社会,而大学除了提供科研成果,还以为社会培养和输送人才作为自身的根本任

务;四是大学与智库社会服务功能的时代意义不同。智库因主要服务于现实社会而表现出鲜明的实用性和功利性,相比较而言,大学服务社会的旨趣则更加长远、更为理性。因此,对于高校智库我们可以拥有这样的理解:高校智库不是将整个大学视为智库,而是大学拥有智库之功能,或者说,高校智库就是高校的智库。当然,我们还要看到,大学和智库尤其是“研究型智库”存在着密切联系。美国兰德公司创始人弗兰克·科尔博莫曾经有过十分精彩的描述,在他看来,“智库”就是一所“没有学生的大学”。对以学术研究为导向的“研究型智库”,一方面,其形式酷似大学,主要使命在于促进公众对困扰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外交等问题的认识;另一方面,“研究型智库”又不同于大学,他们主要通过举办研讨会、专题讲座、撰写研究报告等形式,为政策制定者提供决策咨询服务,服务的对象并非学生。基于如此分析,我们可以做这样的延伸描述:智库是一座“没有学生的大学”,而大学则是一个“有学生的智库”。

张:您说大学是一个“有学生的智库”,但在实际工作中,大学里的研究成果往往会被实务界认为过于理论化,缺乏实践指导意义,有些“曲高和寡”或者“阳春白雪”,用时下流行的话来说,就是“不接地气”。作为一名大学管理者,同样也是一位学者,能否请您谈谈您的想法。

田:尽管智库工作的主要手段也是学术研究,但其与纯粹的学术研究机构相比,仍存在着很大的差异。通常来看,学者之学术研究往往侧重于理论模型的建立,对具有普遍性的行为规律进行归纳,因而过于抽象和理论化。学者主要考虑的通常是“是什么”、“为什么”和“应该怎么办”,强调的是事物的机理、逻辑等事物发展之“应然”,而不太关心、很少考虑甚至不愿考虑事物发展之现实可能性。

·专访·



加之大多数学者对政府各项政策制定的目的、规则以及流程都并不清楚,即便有心提出建议,通常也不具备实践可行性,因此,在人们潜意识中,学者常显得“不合时宜”或“空洞”,总难免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相比之下,政府官员更多的考量是“怎么办”、“谁来办”、“谁能办好”等问题,更多的考量是“实然”,一切都要从实际出发,求实效。

此外,学者之学术研究常常持有“求异”思维,总是希望自己的研究成果表达新颖,不同于他人或前人,因此不仅在形式表达上求异取新,而且更倾心于内容上的与众不同。但政府官员更多的是“求同”思维,试图成就一番事业,必须赢得领导、同僚和群众的关注、理解、响应和支持,因为一味地求异,必定丧失成就事业的基础前提。而智库强调以(公共)政策为研究对象,以影响(公共)政策为目的,因此智库关注的是当下,力图解决现实问题,而表现出务实、可行的特色。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发现,智库的工作路径和旨趣似乎更加“接近”于政府官员。我们甚至可以将高校智库的“现实性”特征比较直观或形象地描述为“做好学者与官员之间沟通的桥梁,并为官员科学决策提供咨询服务”。确实,在“现实性”特征表达方面,高校智库极易陷入“偏学术研究”的误区,成功的高校智库其经验往往正是对这一“先天性缺陷”的有效规避,而绝大多数高校智库运转欠佳或失败的教训也往往是没有很好地应对和处理这一问题。

张:但同时我们也看到,高校有着最一流的学者、最先进的思想,这可以说是高校智库的“先天优势”。

田:是的,在新型智库建设进程中,

高校拥有的独特优势有三点:一是高校作为新知识和新观念的发源地,其创造性思想不仅对人类社会具有深远意义,对促进政府科学决策、谋划社会和谐发展也具有现实价值;二是高校与政府之间存在着天然的联系。一方面,政府是绝大多数高校的投资主体,高校必须紧密围绕国家发展需求,确定自身的发展重点和方向。另一方面,与官方智库相比,高校智库建设具有较强的独立意识和宽松的学术氛围,可对政府的决策提出质疑和批判,这无疑有利于政府科学决策;三是高校拥有全国近80%的社会科学力量、60%的“国家千人计划”人选者、50%的两院院士,以及规模庞大的研究生队伍,不仅能提供充足的人才保障,还能依托自身雄厚的科研实力、丰富的数据信息、广泛的合作交流等优势,创造出既有战略性、前瞻性,又有操作性、针对性的研究成果,服务于国家和政府的发展需求。因此,无论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之客观需要,还是大学自身生存、发展之主观诉求,在新型智库建设浪潮中,大学应该有所作为,也能大有作为。

三

张:与一般智库相比,大学本身的社会公益性质更为鲜明。甚至可以说,高校智库的“独立性”、“非营利性”特征是一种“天性”。

田:我同意你这个说法。当然,高校智库的“独立性”特征在很大程度上不是源起于一般智库的特征规定性(即组织运行独立于政府),而是发端于现代大学的基本特质,这就是大学的“学术独立”和“学术自由”。一般地说,“学术独立”是

指学术独立于政治意识形态。“学术独立”和“学术自由”不是大学所固有的特征,而是与教会或世俗政权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争取而来的。欧洲几乎所有的古老大学无一例外地经历过这一艰苦卓绝的斗争过程。例如,巴黎大学在雏形时期,就曾为了取得自治权而展开斗争,为争取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很多学生曾经流血甚至牺牲。直至19世纪初期,以柏林大学为代表,强调“大学独立与学术自由”、“科研是大学主要功能”为核心的“学术自由”理念才得以确立。所谓“学术独立”和“学术自由”,是指大学始终以真理探索为使命,学者只服从理性、服从科学,不服从任何政治和宗教。理性主义大学理念认为,现代大学既是向学生灌输知识的机构,也是创造新知的场所。教学与研究,或者说传授知识与生产思想,乃为现代大学的两大目标。可以说,“学术独立”与“学术自由”,是西方近代大学的基本特质或核心理念。在理性主义大学理念主导下的大学很难找寻到“智库”的“痕迹”。当实用主义大学理念主导现代大学之后,“社会服务”便成为现代大学的又一主要功能。尽管现代大学正经历着世俗化、社会化、功利化的过程,但人们呼唤重塑“人文精神”和“大学精神”的声音依然不绝于耳。真正有历史担当的现代大学依然守护着“学术独立”与“学术自由”的精神家园,现代大学也许不可能再重新回到“象牙塔”时代,但也不该彻底沦为社会的“服务站”。因此,高校智库的“独立性”不仅表现为一般智库操作层面的“独立性”,更多的是精神、理念层面的“独立”与“坚守”。

张: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与自然科学研究不同,“政治性”和“意识形态性”是

·专访·

其无法摆脱的“藩篱”，您认为在这样的现实国情下谈“独立性”，是否是“戴着镣铐跳舞”？

田：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尖锐。我最近受学校党委委托，主持大学章程的起草工作，在认真检索、研读相关文件和文献之后，也产生了自己的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明确规定，普通高校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中国现代大学办学必须依据国家法律，这是“红线”，绝对不可以逾越。总而言之，中国大学必须坚持“党委领导、校长负责、教授治学、民主管理”这一基本原则，这是中国大学区别于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大学之体制特色。在既往办学实践中，“党委领导、校长负责和民主管理”的原则得到了比较实在的贯彻，而今，国家试图通过大学章程修订等改革措施，有效推进“教授治学”，更实在地说，就是在现行体制条件下，如何最大限度地弘扬“学术自由”和“学术独立”。

因此，在现行体制条件下，高校智库建设就必然面临着“独立性”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处理问题。如何理性应对并妥善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这是十分敏感却又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我认为，高校智库的“独立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大学本身强调“学术独立”和“学术自由”，在本质上排斥或拒绝任何宗教、政治意识形态的干扰；二是高校智库尽管也是以学术研究为核心或手段，但在工作性质、成果评鉴等方面区别于大学之“纯学术研究”，因此，独立或相对独立于大学主体，不仅是一般智库建设的客观要求，也是高校智库建设的主观诉求。相比较而言，第一层面的“独立性”意义理解更为关键。

我的看法是，“独立”不等于“中立”。所谓“独立”，是指智库运行的程式或存在的方式，而所谓“中立”则是指智库的价值取向或意义问询。问题的症结就在于，现实中很多人要么把“独立”理解成“脱离”或“背离”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否定学术研究的“政治性”存在；要么混淆“独立”与“中立”的概念，强调所谓的“价值中立”。这些认识极易容易导致在实践中将“意识形态性”误读或异化为“意识形态化”。无论是一般智库建设，还是高校智库建设，在本质意义上都属于文化建设的范畴，而“文化”总是带有“意识形态性”，但“文化建设”绝对不能“意识形态化”。人类社会活动十分复杂，由于社会成员各不相同，故而很难找到简单、精确和普适的抽象理论或通用法则来解释

这些复杂的社会事实和现象。这便是文化研究和文化建设的复杂性所在，这种复杂性可以从人文社会科学及其研究特点的分析或解读中得到清晰的理解。

与自然科学研究不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结论验证具有不可重复性，而且其实践的验证需要漫长的岁月。在人们的经历或经验中，自然科学研究的失败，不仅可以得到普遍的理解和体认，甚至还能赢得大家的称道与赞扬，但人们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失败”似乎就没有了对待自然科学研究失败的“雅量”。面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失败”，人们习惯地认为研究者本人思想有问题、政治立场有问题，甚至整个人都有问题。显然，这是一种“意识形态化”的路径依赖。或者说，人们总是习惯于给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以某种政治判断或人为地贴上意识形态标签。确实，与自然科学研究不同的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无法摆脱“学术性”与“政治性”关系的纠结。人文社会科学所有的概念和范畴都产生于某种特定的社会现实，因而永远无法超越其赖以产生的社会现实本身。如何实现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学术性逻辑与社会意识形态的政治性逻辑之间的调和，便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界无法回避的难题。这一逻辑冲突的根源在于价值论的矛盾。

区别于自然科学研究，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具有认识主体与客体“二位一体”的基本特点。从认识论视角来审视，自然科学研究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之间其实并无本质之差异，这也是两者在某些理论、观点、方法上具有相通性的根本性原因。但是，这种认识论上的统一性并不能遮蔽二者在价值论视角上的巨大分歧。人文社会科学在价值论上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否认政治性对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影响，而一味地追求所谓知识论上纯粹的“价值中立”，不仅使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论”意义过度放大，而且也违背了人文社会科学两重性的逻辑特点，这无异于将人文社会科学完全等同于自然科学，其结果必将使得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举步维艰；反之，将人文社会科学的价值意义推向极致的观点也有失偏颇，其后果必然导致“意识形态化”，从而给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带上沉重的桎梏。因此，试图有效调适学术性与政治性之间的矛盾冲突，必须解决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价值取向问题。价值取向的问题，不是单纯的理念层面的辨析和界定，更重要的是理性应对和妥善处理实践层面上的诸多问题。有效把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价

值取向或意义问询，必须在实践中正确处理好现实与理想、科学性与意识形态、规范与自由等一系列关系问题。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任何“意识形态化”的认知与行为在本质上都是狭隘的历史产物而必然带有时代局限性，“意识形态化”的路径依赖必然导致行为方式上的故步自封。文化建设十分敏感，也十分复杂，我们不能简单地贴上意识形态的标签，更不能轻易地作出某种政治判断。

我认为，中国高校智库建设在应对“独立性”和“政治性”关系问题时，必须拥有两点清醒的认识：一是推进中国高校智库建设无疑需要学习和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大学智库建设的先进理念和成功经验，但绝对不能脱离中国现行政治体制这一基本现实，全盘照搬西方所谓的“民主”观念，或脱离现实地无限放大大学“学术独立”、“学术自由”之特征，否则，智库建设尤其是高校智库建设必然会陷入教条主义之泥潭；二是加强中国高校智库建设需要尊重或遵循中国现实政治体制之意识形态，但在实践中不能随意或轻易给学术研究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作出某种政治判断。换言之，我们不能因为人文社会科学及其研究之“意识形态性”特点而给予人文社会科学及其研究成果评鉴“意识形态化”。

因此，尊重中国国情，一切从中国实际出发，是智库尤其是高校智库建设的先决条件。

张：当今社会，我们都强调大学的“社会服务”功能，这就要求大学必须以解决现实问题为其重要的研究导向，这是否与大学本身所必须具备的“学术独立”、“学术自由”相违背？

田：就大学理念而言，无论是理性主义理念，还是实用主义理念，都是大学发展的历史产物。历史的延续性和继承性决定了这是两种不同理念主导大学发展的历史阶段，无论是坚持理性主义大学理念的保守观点，还是坚持实用主义大学理念的激进看法，在本质上都是有失偏颇的。现代大学既有理性主义大学理念的延续和传承，也有实用主义大学理念的诉求与体现，我们不能将其具有延续性的历史发展阶段武断地割裂开来。换言之，我们不能因为大学必须服务社会而全盘否认大学“学术独立”、“学术自由”等核心内涵，而使大学堕落成为社会的“服务站”；也不能因为强调大学“学术独立”、“学术自由”等核心内涵而排斥甚至否定大学应有的社会服务功能，固守传统的“象牙塔”。可以说，大学发展至今，一方

·专访·



面执守着独立自主、开放包容、秉承理想、自由探索这些传统理念；另一方面，大学又渴望变革转型，试图引领社会，两者之间所呈现出的巨大张力，已渐渐成为现代大学的基本特质，而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平衡，也成为现代大学不尽的纠结。

尽管在日渐成为主流的实用主义大学理念主导下的现代大学越来越强调自身的“社会服务”功能，但现代大学依然是向学生传授知识的机构，也是创造人类新知的主要阵地。换言之，现代大学并没有因为“社会服务”功能的彰显和强化，其原有的“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功能而相应地消解、弱化甚至消失，知识传授和知识创造，依然是现代大学的两大目标。“学术独立”、“学术自由”始终是现代大学核心理念。所谓“学术自由”，其基本含义是指大学教师拥有发表、讨论学术意见而免于惩罚之自由，这种自由意味着政府必须以制度性的规定加以保障。如果说“学术自由”是现代大学之基本精神，那么，“学术独立”则是现代大学之灵魂。保持“学术独立”、“学术自由”，无法回避学术与政治的关系。“学术独立”并非超然于政治之外的绝对自由，而是一种相对的独立。也正因为学术研究无法真正脱离政治影响而独立存在，所以我们才会面临着如何处理好政治与学术之关系问题。事实上，现实语境下的学术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可以准确表述为：学术研究如何保持与政治的距离？秉持非政治、非实用、非功利之动机，以探

求新知为目的，是“学术独立”、“学术自由”之基本要求。学术界与政治界应该是两个相对独立的界域，一方面，学术界应坚持“为知识而知识”之理念，必须与各种政治思潮、政治派别保持必要的距离。另一方面，政府不应过多干涉学术机构之学术研究，政治势力不能渗透到大学及研究机构之中，更不能影响学术研究及知识传承。

然而，从世界范围看，现代大学的“学术独立”、“学术自由”道路并不平坦和顺畅。20世纪30年代以后的世界学术发展逐渐从“团体运动时代”进入“国家主义时代”，国家倾其全力发展学术事业，学术研究日益成为国家发展战略。在学术研究计划性得以空前强化的同时，国家权力对大学“学术独立”、“学术自由”的干预也前所未有地得以强化。在学术研究计划性成为世界学术发展潮流的趋势下，现代大学为保持“学术独立”、“学术自由”，从未停止过对于政府干预学术的抗争。相比之下，中国大学的“学术独立”、“学术自由”道路更为艰难和曲折。民国时期起，一方面政府从未放弃过对大学的政治控制，这种控制和干预不仅表现在强化新闻出版检查制度，控制学术成果发表出版自由，而且还以行政手段对大学教学和研究进行干预（如介入大学课程的设置等），进行所谓的“学术统制”。政治势力对大学“学术自由”的干涉，使得中国大学教育出现了职业官僚化、教授营业化、学生政治倾向化，大学“行政化”倾向日趋严重。另一方面，多数中国知识分子秉承传统士大夫“学而优则仕”之观念，恪守“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之金科玉律，始终以服务政治为己任，他们从来没有作为一个整体谋求价值追求的独立。即便是作为中国近代大学之先驱，北京大学虽然在五四运动前期等少数几个时期曾经有过独立精神的探索，但就其整个发展历程而言，这所大学距离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独立”、“学术自由”依然任重道远。可以说，从中国大学的整体来看，“学术独立”、“学术自由”之路才刚刚起步。

尽管从理论上说，学术研究（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离不开政治，且理性与政治可以实现理论上的统一，但历史上和现实中的中国大学却经常会遭遇到必须做出抉择的两难尴尬。可见，“学术统制”是政治势力干预大学“学术自由”的集中体现。民国时期以降，中国现代大学所追求的独立、自由精神与政府的行政干预之间，始终存在着巨大的张力。这

种张力长期存在并发挥影响，无疑构成了影响中国现代大学发展的棘手问题。现代大学“学术独立”、“学术自由”之路尚且如此艰难和曲折，高校智库为保持其“独立性”，其难度便可想而知。因为无论是以人才培养和探索新知为己任的大学，还是以服务现实社会为主旨的大学智库，学术研究始终是其核心内涵和主要手段，而对学术研究而言，“学术独立”和“学术自由”则是一个灵魂，只有在独立、自由的原则前提下，学术研究才能拥有高价值的创造。因此，富有成效的高校智库建设必须弘扬学术自由。

张：在弘扬“学术自由”的道路上，地方高校似乎话语权更少，比如苏州大学。

田：在现行教育体制下，地方大学（包括京城之外的部属高校和省属高校）的学术地理生态十分恶劣，相对于自然科学研究而言，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则更是严峻。这种学术地理生态的严峻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国家根据中央和地方的需要层次，一方面强调对大学实行“分类管理”，采用人为的、标签式的管理模式，对大学进行分类和分级。另一方面，由于政府对大学的高度干预，大学没有办学自主权，加之“计划经济思维”的大学评估模式，使得大学并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特色发展和错位发展。这两方面的因素不仅导致有限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公，而且还会造成有限教育资源的极大浪费。有学者曾做过这样的描述：就人文社会科学学科而言，中国80%的地方大学分摊着不足20%的高等教育资源，而20%的部属高校却“霸占”着80%多的高等教育资源。二是政府财政体制的制约，加剧了大学与其主办方的财政关联度，这种体制使得地方大学尤其是省属大学获得政府财政的支持极其有限。我曾做过形象的描述：地处省城的大学不如地处京城的城市；地处省辖市的大学不如地处省城的大学。这种“区域性”差异必然导致大学发展的“马太效应”。因此，在现行体制条件下的大学，尤其是地方性大学，为了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大胆创新办学理念。

以苏州大学为例，苏州大学既没有部属高校“身份”优势，也没有京城、省会的地理优势，东有上海、西有南京、南有杭州，地处长江三角腹地，从学术地理生态看，苏州大学地处典型的学术“低洼地”。尽管苏州大学地处经济高度发达之长江三角洲腹地，但囿于地方财政体系的束缚，作为省属大学的苏州大学并不能分享地方经济发展之“红利”，此外，作为地

·专访·

方综合性大学，苏州大学还要承受着高等教育大众化(扩招)的沉重压力，办学之路可谓是举步维艰。因此，现代大学尤其是地方高校如何有效履行“社会服务”功能，并谋求自身可持续发展，便是一个现实难题。应该说，苏州大学东吴智库建设是一个典型的成功案例，我们可以从其发展历程和业绩中获得一些启迪：近年来，苏州大学在精心守护精神家园的同时，应当勇敢地推到“物理围墙”，始终秉承“以服务谋发展、以贡献求支持、以合作促双赢”之办学理念，密切与政府、行业之关系，探索出“以合作平台为载体、以项目投放为路径、以成果共享为目的”的校地、校企合作双赢机制，并将这种富有成效的运作机制以制度形式给予表达。在这一机制下，苏州大学东吴智库充分发挥大学频繁的国际学术交流、丰富的图书情报资讯等科研优势，有效整合校内外、国内外人文社会科学优质师资(乃至自然科学学科师资)，并根据苏州、江苏乃至国家层面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与政府、行业合作组建研究机构(如与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共建“地方政府与城市治理”决策咨询研究基地、与苏州市委组织部共建了“苏州党建研究所”、与新加坡邦城规划咨询顾问有限公司共建了“苏大·邦城未来城市研究中心”等等)，开展了一系列富有成效的社会服务工作。

四

张：您刚才提到东吴智库，作为东吴智库的创始人和理事长，能否分享一下您对成立东吴智库的思考？

田：我前面已经谈及了苏州大学近年来办学理念的创新，也正是在一种全新的办学理念指导下，萌生了“东吴智库”。苏州大学东吴智库的前身可以追溯到成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苏南发展研究院”。多年来，“苏南发展研究院”扎根苏南地区，通过系统总结出诸如“张家港精神”、“昆山之路”、“园区经验”等苏南发展经验，有效诠释了“苏南模式”，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产生了重要的社会影响，并凝练出“立足苏南，服务江苏，辐射全国，影响海外”的办学特色。到了 2011 年，为了进一步有效整合资源，提高社会服务效能，我们经苏州市民政局注册登记成立“苏州社会建设研究院”，为非盈利性质、具有法人资格的社会组织，并在 2014 年 1 月更名为“苏州东吴智库文化与社会发展研究院”，简称“东吴智库”，

这是国内高校首家以“智库”形式注册登记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

张：东吴智库自成立以来，品牌效应不断形成并日益拓展，受到教育部、省委省政府领导的高度关注，我想在发展过程中必然有自己的优势和特色，能否请您分享一下？

田：东吴智库的优势特色呈现为以下四点：第一，前瞻优势。早在 2009 年，我校在推进国际化战略过程中，便开始酝酿“东吴智库”建设。在教育部组织制定《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过程中，我校作为地方高校代表，应邀参加了“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专题研讨会”，专题汇报了有关“大学智库”建设的基本想法。2011 年底，我校便以“苏州社会建设研究院”名义注册登记的非营利性且具有法人资格的社会组织(2014 年初更名为“东吴智库”)，成为国内高校首家以“智库”名义注册登记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第二，学科优势。苏州大学系国家“211 工程”重点建设高校、“2011 计划”首批认定高校，现有 24 个一级学科博士点，覆盖 168 个二级学科博士点，成为博士点学科覆盖率最高的大学之一(仅次于浙江大学、中山大学之后，位列全国大学第三)。在人文社科方面，现有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特色城镇化研究中心)、江苏省优势学科(政治学、艺术学等)、江苏省重点学科(应用经济学、中国语言文学、教育学、统计学等)和江苏高校协同创新中心(新型城镇化与社会治理协同创新中心)等优质科研资源，学科优势十分明显。第三，人才优势。

历史悠久、学科齐全、区位优势等办学特点吸引和会聚了一大批优秀人才，覆盖了几近全部人文社会科学学科。近年来，学校在科研项目、成果表达、成果转让、成果获奖等方面均有出色的表现。第四，区位优势。苏州地处“长三角”腹地，这里诞生了“张家港精神”、“昆山之路”和“园区经验”等改革开放经验。地处这片经济热土，奠定了学校事业发展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事实上，籍苏州之区位优势，学校在“人才强校”、“质量强校”、“文化兴校”以及“国际化战略”等进程中，均有出色的业绩。东吴智库的发展也离不开地方党委和政府的大力支持。

张：作为一种新生事物，不可避免地遭遇一些发展困难。我想，东吴智库也不能例外。能否请您谈一下东吴智库面临的发展瓶颈、建设路径和应对举措？

田：俗话说，有高山必有深谷。我在陈述东吴智库优势的同时，也将其发展的瓶颈问题暴露出来了。比如说，东吴智库所拥有的学科优势，只是一种学科齐全的优势，这无疑是一种数量上的优势，从质量层面来考量，与国内一些著名大学相比较，苏州大学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学科优势并不明显。我们已经清醒地意识到这一危机的存在。在后续发展中，我们必须采取有效措施，进一步凝练学科特色，争取在某一方面或某些方面做大做强。事实上，我们已经积淀了相当的发展基础。比如在“新型城镇化与社会治理”研究方面，我们不仅拥有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特色城镇化研究中心)、江苏省高校协同创新中心(新型城镇化与社会治理)和江苏省高校创新团



·专访·

队(新型城镇化与社会治理),而且还与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共建了“地方政府与社会治理研究中心”等校地合作研究平台,这为我们整合优质资源,打造“新型城镇化与社会治理”特色提供了可能。再比如,东吴智库所拥有的“前瞻优势”,从本质上讲,只是苏南地区率先发展的优势。从研究角度看,我们不难发现,既往应用研究成果的表达多为对先发经验的总结,而缺少一些前瞻性的引领或预测。作为智库,应该更多地思考若干年之后的经济社会发展问题,并产出具有建设性的对策和建议。显然,在这方面东吴智库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在这方面,我们将借助大学学术交流的天然优势,加强国际学术交流,通过深度解读国外发达国家发展经验,有效结合中国国情,向政府提供有质量、有分量的决策咨询报告。

总之,作为一家综合性的大学智库,东吴智库建设和发展路径无疑是“凝练特色、错位发展”。我们坚信,通过若干年努力,东吴智库一定能够成为特色鲜明的综合性大学智库,引领着苏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文化繁荣。

张:您能否对东吴智库未来之特色做一些前瞻?

田:作为一家综合性智库,东吴智库的第一个特色应该就是“综合性”,这一特色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综合性大学特征之使然;二是苏南地区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之于苏州大学的客观需

求是全方位的。第二个特色是“地方性”,这一特色是由苏州大学在苏南地区无法替代的地位所决定的,一方面,扎根苏南、错位发展是苏州大学发展的主观诉求和必然选择;另一方面,一流的城市必须拥有一流的大学与之相匹配,作为地方大学之翘楚的苏州大学,也必然是苏南地区文教事业发展的自然选择。第三个特色应该是“前瞻性”,从根本上说,这种“前瞻性”来源于苏南地区经济先发之优势。从内容来看,具体表达为两个方面:一是城镇化;二是文化研究。

从国情看,目前“城镇化”实践有两种表现形态:一是顶层设计、自上而下的形式,这是一种“外在型”形式,在一些经济社会发展欠发或后发地区推动城镇化进程,难免有“偃苗助长”之险,最为极端的例子就是“鬼城”的出现。二是“内生型”形式,在经济先发地区,土地已经不再是粮食生产、人类居住的主要载体,作为一种战略资源,它拥有了更多的价值空间。个中不仅有城市不断扩张的客观需要,也有失地农民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对都市生活的主观向往与追求,城镇化极其自然地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事实上,从目前情况来看,似乎也只有“内生型”的城镇化道路,才能构成与西方发达国家学界对话和交流的学术语境,也才能成功借鉴这些国家城镇化发展的先进经验,有效规避他们城镇化道路中曾经经历过的教训。我认为,教育部当年将大学唯一的“中国特色城镇化研究中心”设置

在苏州大学,必然有这样的布局考量。

此外,从人类社会规律看,经济飞速发展之后,必然会遭遇一系列社会发展问题。换言之,“硬实力”提升之后,国家必然面临着“软实力”提升的问题。文化建设也就极其自然地上升为国家战略。作为一座千年历史文化名城,苏州在获得经济发展奇迹之后,文化的保护与繁荣等命题必定早先于其他地区。我可以肯定地说,有关吴文化抢救、保护和繁荣的研究成果,无疑能够给其他地区带来启示,这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必将功德无量。

正是基于这样的考量,我们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时,优先关注了“文化建设”和“社会治理”问题,将名称确定为“苏州东吴智库文化与社会发展研究院”(简称“东吴智库”。)

张:我们很荣幸地分享了您对于智库概念的理解以及智库建设的经验,谢谢田校长!

田:上述有关智库的概念理解、功能和特征分析等也不全是我个人的研究成果,我只是比较系统地研读了国内外有关学者的科研成果,并加以了整理和消化,我们应该感谢这些智库研究专家和学者(我就不一一列举这些研究者的姓名了)。作为先行者,我们的实践稍稍超前于同行,这是让我内心感到十分自豪的!

张:再次感谢您的分享,也感谢您拨冗接受采访,谢谢!

